

“给生命让道”，做起来很难吗

社会热点

近日，就“急救车遭堵，3公里走40分钟，伤者死亡”一事，北京急救、交管两部门已开会商议，今后遇到危急重症患者急救转运时，“交警为救护车开道”将成为常态。卫生部也在牵头制定相关政策，包括去年已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的《院前急救急救管理办法》。

急救车遭堵，其实是个老大难

问题，这一次因为急救医生的现身说法，活生生的悲剧更加刺痛人心。如果救护车上的就是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亲人，生命一点点消失，该是多么令人悲怆！

有关部门提出的新措施，比如危重病人由警车开道，急救车有望安装摄像头采集违法信息等，这些制度上的改进非常必要，但是，“给生命让道”，如果没有警车开道，没有摄像头监督，我们就真的做不到吗？

必须意识到，在解决急救车被堵的问题上，人是最核心的因素。给急救车优先路权，此前并非无法

律保障。无论是国家的道路交通安全法，还是北京的相关实施办法，对此都有较细致的规定，甚至还有相应罚则。比如，未按照规定让行或违反规定在应急车道内行驶或停车，处200元罚款。但这些法律在现实中的执行情况，并不乐观。

这一次曝光“急救车遭堵、伤者死亡”的医生就提到，“一路上，及时避让的社会车辆不超过4辆”。这数字让人遗憾，但换个角度看，拥堵或者制度不完善，并非绝对的障碍。既然那4辆车能够让，其他车真的都拥堵到无法动弹吗？因为现实的路况，肯定会有一些车

主难以避让、不知怎么避让，但肯定也有相当数量的车主，没有让的意识，没有对生命的敬畏。

执法需要严格、制度有待完善，但不能等到所有问题解决之后，才让急救车畅通无阻。不管理实存在多少问题，在拯救生命面前，“讨价还价”都是不道德的。

因而，在不断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时，车主们也需要“完善”自身的观念和习惯。说起交通文明国家给急救车让道的好风气，很多人会提到他们完善的法律，但对大多数车主来说，让道或许只是一种融入血液的驾驶习惯，而非权衡违法成本

之后的选择。法律是一种底线约束，如果一个社会的“救命”行为，都要完全寄托于法律之力，都要耗费不菲的行政成本，多少有些悲哀。

一位急救医生说，他们最怕堵车，一旦迟到，迎接他们的就会是家属的怒吼——“你们怎么来这么晚？来这么慢还要你们120干什么”！仔细想一想，每个人都可能是患者和伤者，都可能是他们的家属，体会家属和医生的愤怒或无奈，下一次开车听到身后急救车鸣笛时，你还会无动于衷吗？

(转载自《新京报》)

画中有话

文/刘楚汉 图/焦海洋

2岁的儿子似乎在幼儿园受了委屈，为了“搜集证据”，孩子妈妈买了一支录音笔，放在孩子口袋里让他天天带去幼儿园。不少网友感慨：家长老师之间，也要上演“谍战剧”了吗？

原本简单纯洁的幼儿园似乎成了谍战场，听起来有点惊心动魄。就事论事，这位母亲的行为无疑不妥。怀疑孩子受了委屈，首先应该与老师进行沟通、了解情况，以这种方式“搜集证据”，其实已经先入为主地对老师作出了“有罪推定”。

信任缺失，也许已经成为现代人的通病。今次用的是录音笔，

不知道下次，是否如手表摄像机、针孔摄影机之类更先进的工具也会粉墨登场。然而，技术手段能否获得真相尚未可知，却无疑拉大了不信任的鸿沟。让孩子带上录音笔，玩的是技术，可孩子又何尝不是道具。偷录本是为了保护孩子，可随着孩子慢慢懂事，是否反而会对其心理健康产生某种不良的影响呢？

作为家长，当然需要理解老师的辛苦，不能永远孩子至上，稍有不如意便认为受到了委屈。更重要的，作为老师和学校（幼儿园），更需要正确认识工作的特殊性，科学教学、规范管理，杜绝虐童之类恶性事件的发生。

应该看到，幼儿园中的不信任情绪，其实也是社会不信任的传播和扩散。但教育活动自有其

幼儿园上演“谍战风云”



特殊性，互相信任应该是对家长、老师及学校的基本要求。作为与幼儿成长相关的各个方面，都应该努力维护和发展这种信任，而

不是随意破坏信任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愈是社会信任的缺失，维护信任愈需要从小做起。

一家之言

北大教授不应为酒企“代言”

王攀

茅台集团12月12日在贵阳召开媒体见面会，回应对其产品含塑化剂的质疑。在发布会上，北大教授李可基声称，塑化剂的标准本身就是不科学的。他说：卫生部的511函将所有食品中塑化剂含量用同一个简单的数值来规范，本身就是匆忙应急的，是很粗线条的参考，该标准本身是不科学的，或者在科学上是有局限的。李可基还谈到三聚氰胺，他表示三聚氰胺基本是无毒的物质，成人继续喝下去不会损害人体。

提到三聚氰胺，人们无疑会想到2008年爆发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，在这一事件中，受害儿童多达30多万；当年9月，官方确认住院重症患儿1万，死亡4例；到2011年，在事情过去三年多后，仍有3万患儿没有得到合理赔偿……

但在这次发布会上，李可基一方面为塑化剂、三聚氰胺解围，另一方面又说，“人类几百万年都没有灭绝，说明人类的排毒、解毒能力实际上是非常强大的。过去一百多年间，各种各样的有毒有害物质，铅、砷、汞、二恶英等这些物质都是几十倍、上百倍在增加，但是人的寿命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增加了一倍。所以各种有毒有害的物质我们基本上都应付掉了。因此相信自己，使自己心理得到平衡有利于健康长寿。”

实在是荒谬之极！老百姓对食品安全零容忍，官方声称对食品安全零容忍，全世界都在强化食品安全，采取严厉的标准防止食品安全，李可基却逆社会潮流、违社会常识而动，以“人类的排毒、解毒能力实际上是非常强大的”为淡化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后果，这不得不令人怀疑，李可基是否从茅台那里得到了什么好处？在科研实践中，学者应当“为科学而科学、为真理而真理、为学术而学术”。但现实中，一些专家学者却背离良心，为利益集团背书，沦为代言人。

专家学者的声音，应该出现在国家政策的科学讨论中，出现在学术机构的科研会上，甚至出现在公共机构的论坛上，但唯独不应该出现在一个企业的公共活动上。当一个教授作为座上宾，站在企业公关舞台上的时候，他所说的一切恐怕都很可疑，尤其是身处北大这样著名学府的教授，李可基更应自爱。

频繁打折，商家丢了什么？

方宇白

2012年12月12日，这个看上去有点数字巧合的日子，让刚刚在“双11”疯狂了一把的电商再度亢奋起来。许多中小卖家摩拳擦掌地准备借此创造年尾销售新业绩。而在传统商家领域，首波“不打烊”促销虽然落下了帷幕，某著名百货店又将在本周末推出第二波为期三天“不打烊”活动。在一个个弹眼落睛的销售数字的背后，我们不禁要发出这样的疑问：商家除了忙着数钱，还要忙些什么？

靠打折来攒人气，在海外也非常盛行。每年11月的第4个星期四是美国的感恩节，感恩节的第二天俗称为“黑色星期五”。每年美国

“黑色星期五”打折促销期间，各大商场都会引起人山人海的疯狂抢购，但“黑色星期五”一年只有一个，没有听说过美国的商家会连续举行“黑色星期五”。

1天时间、2.13亿网民、191亿元的支付宝成交额，“双11”被誉为中国电商具有“历史性的时刻”，并成为“拉动内需的强劲力量”。电商和商家忙着数钱，而消费者的钱包瘪了下去。当一张张信用卡被“刷爆”之后，其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已经逐渐显现：在一些城市中，新结婚的夫妻因为一方迷恋于网购而离婚的事情，已经不再是新闻；“啃老”子女迷恋网购而让年老的父母背上巨额债务，这些无疑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不知道新一轮的电商

促销大战，会带来怎么样的荒唐行为？

超大力度的营销活动也是一把“双刃剑”，当消费者习惯于只在3折、4折的促销力度下才出手购物时，商场平日的人气会受到进一步冲击，为冲销售业绩，商家不得不再增加促销力度，而品牌方则会以不断提高定价来应对，从长远角度看，这并不利于整个零售市场的健康发展。同时，频繁的大力度促销，也使得购买力、供货量和服务能力等面临着多重考验。一件衣服，它的利润空间摆在那里，厂家要赚钱、商场要赚钱、供应商也要赚钱，一味地打折，怎么保证合理的利润空间呢？

与频繁打折相比，另外一些企

业则通过频繁推出新品来吸引公众的眼球，iPhone5、iPad mini、iPad4在今年相继上市，使得许多追求时尚的年轻人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来追逐新品，甚至出现了“卖肾买手机”的极端案例。在强大的商业宣传攻势引导下，不少成年人尚无法保持淡定，何况中小学生？

电商的促销与苹果频出新品，看似没有联系，实则皆是为过度物欲“服务”的渠道，这使得传统的量力而行、适度消费、节俭等美德逐步被边缘化，以时尚、新颖、智能、便携、用过就扔，即所谓的“高品质生活”，其结果是让许多人的消费观念和判断产生严重异化、扭曲。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

纠结“摇号”只因交通供给滞后

李晓亮

前一段时间，北京出了一个被戏称为“摇号帝”的牛人，引起一阵热议。那个神奇的名字“刘雪梅”，连续7月中签。如此高度巧合之事，自然引来了大家对摇号舞弊的群起质疑。至少这事儿上，“阴谋论”没站住脚。媒体调查发现，“摇号帝”系重名并无猫腻。

在备受质疑时，北京市小客车

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发出声明，重申：“我们确保每个符合摇号资格的申请人都能够获得公平、公正的对待。”然而又有媒体调查称，“最初在北京执行摇号政策时，北京的4S店、二手车经销商大概备案了将近两个万个二手车牌。”而这些车牌，显然并非来自其后才推行摇号政策的“摇号池”。该消息是否属实？如果属实，“号内号外”迥然有别的“双轨叙事”，自然也亟须权威解惑释疑。

而且，这样“先知先觉，特事特办”的操作路径，不也正是摇号政策受到质疑的关键所在吗？中签率低，是事实。在事实面前，确有一种尴尬的“平等”，就是大家都不容易摇中。但是这样的低效“公平”，并非民众所需。需求和供应的严重不对等，说明民众旺盛的公共交通需求被强烈遏制了。而车号成了行政管控下的稀缺资源，寻租就变得更加容易。有人建议，用如上海等地方的纯市场

方式解决。但即便如此，在供需不平衡时，如此做法成本也畸高不下。

关于摇号，真正的症结还在于，民众公共交通诉求得不到满足。私车爆棚，很大程度上源于公交、地铁等公共交通建设极不给力。相关部门协调不力，城市规划粗糙，公共交通发展受滞，一同导致了“中国式交通”的诸般困扰。而理想状态下，城市交通文化在应对拥堵之外，还能最大考虑人的利益诉求。